

文化软实力向硬实力的转化：依据、路径与契机^{*}

陈 旭^{**}

【摘 要】当前，以国民教育、社会宣传和国际传播为主要途径的软实力建设，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软硬实力发展不均衡的状况。逻辑与历史表明，软实力的根本实现路径必须借助硬实力这一载体。软实力向硬实力转化呈现三种可能的路径：科技创新、制度变革和产业转型。文化通过科技的创新、制度的变革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以促进生产力飞跃、突破发展困境、创造经济价值，成为实现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的基本路径。软实力向硬实力转化所展开的上述路径，有其特定的时代和地域条件，即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进入 21 世纪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东方文明也获得了重生的前景。对中国软实力向硬实力转化而言，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契机和空间背景。

【关键词】软实力；硬实力；科技创新；制度变革；产业转型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由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影响力和外交战略等要素共同组成的有机系统，其中文化始终是影响软实力其他要素的核心因子。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重大战略任务以来，结合国情现状和国际经验，学界分别从话语权提升、传统文化弘扬与转化、文化产业发展、核心价值观构建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视角对有效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①与此同时，国家在实践上则实施了以国民教育、社会宣传、国际传播为主要途径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但迄今为止，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以及所达到的高度仍远不及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软硬实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变迁中的文化主体性问题研究”（批准号：13CKS016）阶段性成果。

^{**} 陈旭，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① 相关成果参见蒋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求是》2012 年第 24 期；李希光《话语权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 年第 4 期；张立文《挖掘传统文化中的软实力之源》，《人民论坛》2007 年第 21 期；夏海军、栗志刚《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江淮论坛》2009 年第 2 期；张晓明《通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求知》2013 年第 6 期。

力不均衡的状况仍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鉴于此，本文致力于从软实力向硬实力转化的角度提出行之有效的软实力发展路径。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中，强大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无不是价值理念、思想理论、制度规范等软实力外化的结果。西方文化经过公元 14 至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和 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孕育了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又通过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逐渐转化为不可抗拒的文化权力；在 20 世纪，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开放性移民国家，通过兼收并蓄逐渐形了巨大包容性的文化观念，进而在竞争中形成实用主义、科学行为主义理念，促进了高效率管理机制、规模化产业运行体制等的形成，为美国引领信息时代的高技术奠定了基础。从以上经验看，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并非完全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软实力影响，更重要的是借助硬实力的载体和各种社会性权力的杠杆实现的。世界从西方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先进的科技中了解、认同和接受了其理性、多元的文化特质。其实质在于，文化软实力通过外化于硬实力从而获得了软实力发挥的载体和实现路径。从我国历史经验看，中华文化通过丰富的物产（如丝绸、瓷器等）、强大的制度（如朝贡制度）产生了强大的对外辐射力。近代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之所以下降，从根本上说并非软实力的下降，而是国家硬实力的衰落导致软实力发挥的载体缺失。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固然形成了丰富的道德资源，但自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一整套现代性规划的冲击下，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上缺乏西方文化得天独厚的社会权力杠杆，大大限制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和空间。^①

然而，现有研究在对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进行阐述时，一定程度上存在割裂软、硬实力的倾向。例如，有观点在坚信“弱国无外交”的基础上，将软实力建设等同于硬实力建设，认为只要国家硬实力强大了，软实力自然会得到提升；^②有观点将软实力建设等同于政治操作和理念贡献，认为只要提升政治操作能力，就能提升国家软实力；^③还有观点将国家软实力建设等同于国家道德建设与对外宣传。^④

① 赵可金、彭萍萍《中国文化软实力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

② 有观点认为，只要中国自己建设好了，别人自然会尊重你。转引自王义桅《三个代表与中国的公共外交》，《学习月刊》2003年第10期。

③ 阎学通认为，在崛起过程中，中国要准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采取更透明的对外政策，更注重与周边国家及欧洲国家的关系，注重提升国家的战略信誉，在战略信誉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采取经济利益服从于战略信誉的原则。见阎学通《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环球时报》2007年5月22日；阎学通和徐进认为，中国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中国变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必须改变政治制度，成为民主国家；另一个选择是中国建立自己的系统，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方向。见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其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潘维则主张，要敢于向西方“普世价值”叫板，大胆确立自己的一整套话语。见潘维《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斗争》，《环球时报》2008年1月28日。

④ 丁学良《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东方出版社，2014，第5页。

这些研究部分地抓住了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途径,但没有抓住软实力建设的核心。软实力具有相对于硬实力的独立性,硬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带来软实力的提升^①;但没有硬实力作为基础,软实力就没有持久发挥的动力和实现途径。政治影响力、道德建设、对外宣传固然涉及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途径,但没有硬实力为基础的政治操作、形象展示和理念贡献只能带来短期的软实力提升,而不能实现软实力的持续发展。因此,增强国家软实力绝非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战略。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属性和价值的自我确认,而是一种需要对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与能量转化之后才能够实现的文化力量。长期以来,中国缺乏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能力,这已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瓶颈性因素。^②王沪宁早前就提出“文化的力量,不仅自本身衍生出来,也要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力量”^③。“文化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和文化民生观点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结果。对发展仍是当下最重要任务的中国来说,将文化软实力内嵌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文化软实力向发展硬实力转化,是形成文化生产力的核心。

二 文化软实力向硬实力的转化:逻辑与历史

软实力本质上来源于硬实力,最终也必须通过硬实力得以发挥作用。软实力的这种实现路径,在历史与逻辑的参照中可以获得理论和经验的依据与支撑。

(一) 从主客体转化到软硬实力转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人的实践本质上不过是主客体之间一种能动的相互转化。主客体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实践虽然造成了主体和客体的分化,但同时又推动着它们走向互为前提、互为媒介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转化运动。所谓主体的客体化,就是“主体将自己的本质力量现实地外化到客体结构之中,从而使客体愈来愈富有主体的本性和结构、愈来愈表现着主体的本质力量、愈来愈人化的过程”^④。在这一过程中,实践的目的和计划构成首要变量。只有目的和计划正确而又切实可行,才能实现主体的客体化。实践过程中的工具与手段,构成主体客体化的重要变量;物质产品的形成则是主体客体化的最终标志。

在一定意义上,文化软实力向硬实力的转化,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这样一个

① 门洪华认为,中国硬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意味着软实力的提升。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② 胡键《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必要性、瓶颈和路径》,《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③ 王沪宁《文化扩展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④ 王永昌《论主体的客体化》,《求索》1991年第6期。

微观基础在文化层面上放大的效应和形态而已。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① 软实力具有无形和非强制两种基本属性，其外延有吸引力和同化力两种基本形态。约瑟夫·奈认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是典型的硬实力^②。从内涵和外延上看，硬实力具有有形和强制两种基本属性，具有支配力和强制力两种基本形态。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属性和作用方式不同，但两者的界线并非绝对明晰：硬实力中蕴含软实力因子；软实力中潜藏硬实力要素。科技就是典型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体，具有硬软二象性。^③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可能单独存在，它们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约瑟夫·奈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时相互扶持，有时相互干扰。”^④ 因此，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文化实力之本质的呈现，它们是彼此互补、相互促进的。在软实力与硬实力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两者也存在相互转化，进而相互强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般地说，硬实力与软实力相互转化有两种方式。一是硬实力的软化。硬实力使人类对物质成果产生“依赖性”，使硬实力延伸出来的软实力产生吸引力甚至同化力；二是软实力的硬化。文化、思想及制度的成功，客观上使其赖以存在的技术、物质等表现出支配力和强制力。主体的软实力可以强化自身硬实力，也可以间接地转化为硬实力。这种转化呈现直接和间接两种形态：软实力通过产业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直接转化为硬实力；通过理念、制度、政策的实施促进经济技术的发展，间接转化为硬实力。硬实力与软实力相互转化的过程，也是两者相互强化的过程，硬实力的软化强化了软实力，软实力的硬化则强化了硬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用于军事进攻的硬实力和用于国际援助的硬实力会衍生出不同的软实力来。因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软实力和硬实力往往是交织在一起使用并共同发挥作用。软硬实力之间转化的最终结果，是国家实力的整体提升。

（二）资本主义起源、发展的精神文化因素

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史，为思想、文化向产业、经济的转化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西方近代史呈现鲜明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的因果链条。其中，产业革命实质上是使科学成果等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转变为物质生产力的过程。恩格斯将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近 60 年中发生的英国工业、交通

① (美) 约瑟夫·奈 《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 2 页。

② 参见 (美) 约瑟夫·奈 《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③ 科技蕴含生存、生产、生活、生态硬实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力量，但同时科技更具有思想、方法、知识、精神、伦理、审美、规范、价值观软实力，对人和社会具有内在而深邃的影响力。科技硬实力与科技软实力是对立统一的，是互补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和相互强化。参见高奇、周向军 《论科技的硬软二象性》，《理论学刊》2015 年第 3 期。

④ (美) 约瑟夫·奈 《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 24 页。

运输以及农业的巨大变化,称作产业革命^①。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为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由此引起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对此,马克思也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工业和科学的力量成为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力量^②。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革命也就是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生产体系组织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飞跃变化,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主要创造者,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形成过程中,精神文化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斯·韦伯以其独特的视角,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之外,看到了精神和文化因素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作用。他认为,新教伦理的理性精神孕育了以普遍法制观念和自由民主思想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再借助商品经济、通信、运输、科技手段和专门的文职阶层,构建了资本主义的“科层制”,最终使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应运而生。这就是新教伦理的理性品质、官僚制之资本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韦伯看来,没有资本主义精神,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制度。^③按照这种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迟迟不能产生的原因,就是缺少一种类似的资本主义精神。唯物史观则认为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确立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制度得以形成的最核心要素。韦伯的论断尽管有唯心主义嫌疑,但至少看到了经济制度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要素,也在某种程度上诠释了文化、精神软实力通过内化为制度安排,从而转化为社会发展硬实力的历史路径。

(三) 文化、经济、技术的一体式发展

从长时段发展趋势看,文化的存在形态经历了一个游离于经济之外的精神、思想或娱乐活动,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拉力,再到与经济、技术深度融合、一体式发展的过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西方的“哲学即爱智”的名言,还是东方的“文治教化”的追求,文化在总体上是游离于经济之外的精神、思想活动,它最多只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间接的精神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促进经济繁荣成为各个国家的中心任务,文化变成招商引资、服务经济的重要平台和拉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文化与政治、经济、科技进一步融合,凸显了三大趋势。一是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二是文化产业的兴盛推动了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三是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总之,全球化潮流使文化嵌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软实力通过一系列杠杆转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7~10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75页。

③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9、12~13页。

化为硬实力的机制和路径日益多元。

可见，以思想、精神和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软实力，向以物质和经济为核心的硬实力转化，从而获得软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有其逻辑的依据、历史的参照，以及文化本身的发展诉求。在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这种转化主要呈现为三条基本路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精神文化—制度变革—经济繁荣”“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经济增长”。

三 在科技创新、制度变革、产业发展中实现软实力向硬实力的转化

文化通过科技的创新、制度的变革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以促进生产力飞跃、突破发展困境、创造经济价值成为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的基本路径，这具体表现为：科技成果通过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硬实力；承载精神文化理念的制度变革通过突破既有的发展困境释放发展硬实力；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产业直接创造了国民财富和经济价值实现经济硬实力。

（一）科学技术的创新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文明成果，包含诸多思想、理论和观点体系，属软实力范畴；但科学革命的成果通过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使物质产品和社会生产力极大丰富和增长，所以科技创新成为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的重要途径。

在人类历史上，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关系经历了从远古时期科学技术一体，到16世纪文艺复兴产生现代意义的科学导致科学与技术的分离，再到19世纪资本主义兴起注重将科学革命的成果迅速促进技术革新，通过引发产业革命，变为巨大的生产力，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逐渐结合在一起，催生了马克思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命题。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产业”一体化与双向互动发展，使科学成果通过技术与产业的革命日益“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①。邓小平更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关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关系，钱学森做了清晰的刻画“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②。其中技术科学是从基础科学理论到工程实践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③。可见，科学是潜在生产力，技术科学大大加速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在托夫勒划分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④中，农牧业、工业、信息业的产业革命分别创造了新一轮的生产力变革和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7页。

② 中共中央组织部《九十年代科技发展与现代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9页。

③ 钱学森《论技术科学》，《科学通报》1957年第4期。

④ 参见〔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2006。

会变迁。掌握了先进农耕技术的古代中国、开拓了工业生产力的近代英国、引领了信息生产力的现代美国，无不长期傲居世界舞台的中央。古往今来，强大国家的硬实力，无不是科技软实力转化为经济、军事力量的历史结果。

另外，科技创新的生成、进程和结果无不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科技创新将其承载的文化价值理念转化为科技硬实力。在农业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务实的诉求和整体、和谐的理念，创造了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和小农经济的繁荣。在产业革命浪潮中，自由、理性、人权、平等的文化理念，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的欧洲成为现代工业革命的先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民主、开放、创新的文化理念，孕育了电子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美国文化价值以先进的技术、丰富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为载体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拓宽了美国文化软实力的辐射范围。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高新技术与文化软实力进一步相互影响、相互拉动。文化软实力对科技创新起着导向和牵引作用；反过来，科技创新为文化的生产、交流与创造提供了更多的物质条件，形成和发展了知识经济下广泛的竞争文化和持续的创新精神。在科技创新与文化软实力的双向互动关系中，文化软实力被内化于科技创新中，并以科技创新为桥梁间接地促进了国家硬实力的整体提升。

（二）制度机制的变革

从历史上看，大国实力的消长同国家制度的变革和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国际关系史上的领导者无不是制度创新的领跑者。从早期海权时代的西班牙、荷兰，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国、法国，再到当今的美国都不例外。制度总是与文化、价值观、发展模式及生活方式相适应，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但制度通过变革与创新能够实现经济增长、释放发展潜力，具有转化为硬实力的隐性能力。^①因此有学者认为，领导国家进行改革的能力是国家实力增长的主要原因。^②文化软实力内化于制度机制中，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各个发展模式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强化了其所承载文化的吸引力和认同。

人类社会具有丰富的制度软实力创造经济硬实力的历史经验。18世纪英国通过确立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旧的生产关系，将英国带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美国针对“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大萧条，实施凯恩斯主义将政府调节和公平要素引入市场经济，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20多年的繁荣期。20世纪80年代，美国针对“政府失灵”带来的经济滞胀，实施里根主义的制度变革，带来了持续10年高速增长的“美国新经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计划经济

① 黄如祺、刘力臻 《论经济制度的“软实力”与经济增长的“硬实力”》，《福建论坛》2012年第3期。

② 阎学通 《改革能力影响国家实力》，《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6日。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实现了以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优化组合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经济增长奇迹。实践证明，转化为经济增长硬实力的能力，乃是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软实力”。但市场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不断地变革更新，超越单一调节机制，实现由“古典体制”向“现代体制”的变革，才能充分发挥向硬实力转化的能力。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以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构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自由理念下的美国模式、公平理念下的德国模式、群体意识^①下的日本模式等。不同的市场模式将不同的文化传统内嵌于经济体制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局限，释放了潜在的经济要素，促进了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倡导自由竞争的美国模式使美国保持了长期的市场竞争力和科技创新力；倡导社会公平的德国模式最大限度地维护市场秩序、完善社会治理，创造了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倡导政府主导的日本模式通过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将资源配置与社会动员结合起来，实现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腾飞。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市场与政府进一步优化组合以应对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挑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市场和政府二元调节机制“双失灵”的结果。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也是国际社会在调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基础上的体制改革实现的。

在同等资源和技术的条件下，制度变革能够使制度超越既有的发展困境，发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经济增长又反过来增强了对制度的吸引力和认同感。将文化理念嵌入构建活力、效率、开放、科学的体制机制，以破除经济发展失衡的困境，解放生产力和释放经济活力乃是未来各国制度变革的大方向。

（三）文化产业发展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历经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等诸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一个以高科技为先导的文化密集型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化产业以其直接创造了国民财富和经济价值，而成为文化软实力向经济硬实力直接转化的重要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关贸总协定（GATT）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为：文化产业是从事具有文化属性的产品与服务的创造、生产和分销的行业……它们有创造财富和工作岗位的潜力^②。把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去经营和发展，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必然实现价值的增值和价值的转移，人的文化需求与物质需求一样，成为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推动力。随着经济与文化互动性的加强，文化

① 车维汉《论日本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特征和文化背景》，《当代亚太》1997年第2期。

② “世界主要经济体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研究”课题组《世界主要经济体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sj/tjcb/dysj/201412/t20141209_649990.html，2014年2月9日。

与不同产业实现深度结合衍生出了多种性质和类型,譬如新兴的“高技术含量和资本密集”的文化产业(如软件产业、创意文化产业等),传统的“高传统技能含量和劳动力密集”的文化产业(如民俗艺术博物馆、民间文化商业街等),知识型文化产业、休闲型文化产业和娱乐型文化产业等。文化与不同产业之间的深度结合,使文化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增值空间。近年来,在出版发行和广播影视业等传统文化产业继续发展的基础上,以网络文化、会展文化、旅游文化、休闲娱乐等为主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的不同形态与新技术手段和传播渠道充分嫁接,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文化产业创造财富,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物质形态。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都普遍高于10%。美国借助其发达的文化产业,从文化资源小国而跃升为文化超级大国。欧洲将其丰富的软实力资源充分加以利用,极大地弥补了其与美国相比较弱的硬实力。日本的大众文化、韩国的文化产业,助推了其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和发展。文化产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文化通过产业化形成规模经济从而产生文化生产力。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并不等于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要通过发展文化生产力,将文化转变为文化软实力,进而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硬实力。

四 在生态文明与东方文明时代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硬实力的转化

必须强调的是,软实力向硬实力转化所展开的上述路径与机制,有其特定的时代和空间条件,这就是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21世纪之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东方文明的潜在优势日益显示出来。对于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向硬实力转化而言,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条件和空间契机。

(一)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世界范围内文化时代维度的转换,为中华文化软实力向硬实力的转化提供了时代条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化并不具有独立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由于生产力的变迁,“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①。在农业时代,中华文化通过丰富的物产(如丝绸、瓷器等)和强大的制度(如朝贡制度)产生了强大的对外辐射力。但进入工业时代,农耕文化因阻滞了资本主义的发育和工业化进程落后而被批判和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52页。

构。但当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能源短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工业文明陷入深刻危机之际，东方文明则日益显示出它的特有优势。在生态文明时代，以东方文化“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取代工业文明“以人克天”的价值取向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因此，世界文明的转换和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为中国软实力向硬实力的转化提供了适宜的历史语境。

（二）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

世界范围内文化空间维度的转换，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硬实力转化提供了空间背景。500年来，西方主导世界格局和发展方向，西方文明和价值观被认为是“历史的终点”与“最高阶段”，^①其他文明需向其靠拢、认同并学习。自晚清以来，中国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开启了近代化进程，不少怀有启蒙情结的人一直信奉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中心主义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首先，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国际格局开始由“一超多强”向“一超走弱，多强易位”转换^②。这些新兴国家大多带有东方国家的集体性身份认同，推动了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加速转移的趋势。其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为核心，围绕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反思和争论构成了国际社会思潮变化的核心内容，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动摇，国际思潮和社会发展模式日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陷入困境之际，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蕴含“天人合一”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而不同”的世界观，为人们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式的行为价值与观念取向。最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东西方之间的深度交往，当代国民置身于广阔的全球化与多元化背景下，他们的文化观体现着世界视野，从而能更敏锐地感知世界潮流的变迁和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境遇，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和平视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在全面治理全球化带来的人类社会问题时，多元文化竞争共存、各有长短。对它们的理性认知，是民众对中国文化抱有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价值源泉。

总之，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日益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国际文化交往也开启了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东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突破以往由西向东的非对称、线性的交往模式，逐步为双向互动的平等对话关系所代替，文化交流愈益走向均衡、多元和对等，形成“东西文化互补论”^③。对于西方文化，我们由仰视到平视的转变，促成了我们在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态度的确立，在此背景和趋势下，承载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物质成果和发展成就，呈现并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质和中国理念，对于推动“东学西渐”进程，以

① 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黄胜强等译，远方出版社，1998。

②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

③ 季羡林《东学西渐与“东化”》，《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3日。

开放的姿态实现软实力向硬实力转化,摒弃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实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融汇、吸收、借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五 结语

人类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时代物质的丰富、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无不是文化生态的体现和文化繁荣的结果;同时,文化生态的繁荣也必将以物质的丰富、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为根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构建了中国软实力的深厚根基。保罗·肯尼迪曾由衷地赞叹“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追求道德教化、提升自觉和对外传播,根本之道是要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嵌入科技、制度和产业,将其转换为发展硬实力,构建软实力得以发挥的深厚根基。在后工业化社会和“大科学”时代,需要关注科技创新与传统科技文化的融合,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理论启迪科学新范式,以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而生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软实力。在西方模式陷入困境下,将生态、和谐、公正、治理等当代新型文化价值诉求内化为制度安排,将经济体制的变革升华为整个文化的合理重建,通过形成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制度文化来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以新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成果推动软实力的不断提升。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文化产业、鼓励创意经济、倡导工匠精神、培育产业文化,使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经济价值,以提升文化凝聚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创造力。构建国家“科技—制度—产业—文化”四位一体的创新体系,助推文化软实力向发展硬实力的转化进程,以实现软硬实力资源优化整合、创造、转化、更新和增值,从而为构建文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ft Power to Hard Power: Basis, Path, and Opportunity

CHEN Xu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soft power, through n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propaganda,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of uneven in soft and hard power in China. Logic and history of it have shown that the fundamental path of the realization of soft power is bound by the carrier of hard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ft power to hard power presents three possible path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

^① (美)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第7页。

tion.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e of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e is the basic way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ft power into hard power by promoting productivity, breaking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of development, and creating economic value. The above path soft power to the hard power are under specific times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namely, the industrial era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of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However, when entering in twenty-first Century, human society began to enter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riental civilization has also been reborn prospects. It means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and space backgroun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ft power to hard power.

Keywords: Soft power, Hard pow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